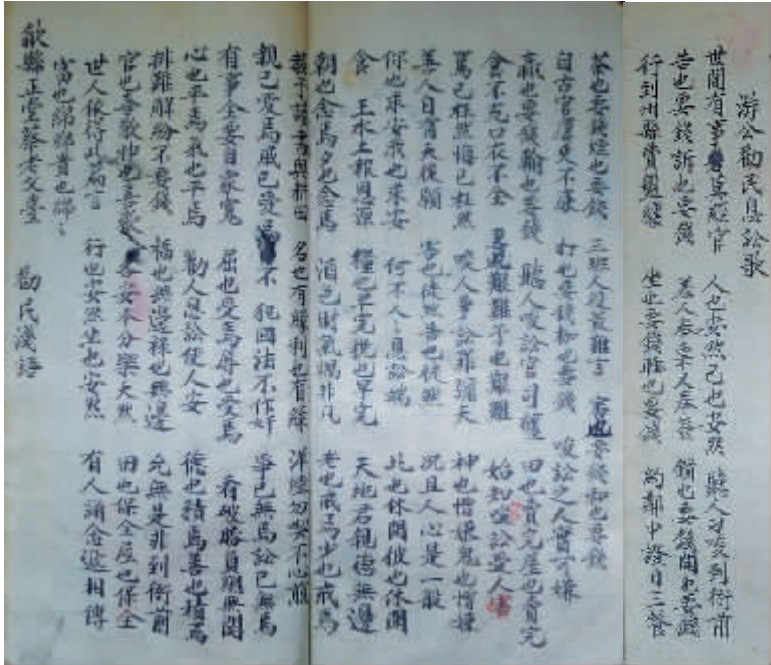




清代流传于徽州
的“劝民息讼歌”，
民间日用类书抄本，
王振忠收藏

◀ （上接 12 版）

《海阳纪略》中，就有《申飭原告自拘示》和《告词条规示》等，其中就提到：休宁县健讼成风，为官者既不能使民无讼，只能在诉讼实践中想方设法解救民众。他说，向来两造告状，官府一定要派皂快前往拘提，事无大小，而皂快视为奇货，需索酒食、路费，贪得无厌。为此，他颁布告示，规定此后凡是不得已打官司的，就发给纸皂纸牌自拘：原告领牌，亲自交与该保甲，保甲即交被告，逾期不到应诉者，责被告。倘原告匿牌不交，诬稟添差者，即拘保甲讯实，除告词不准外，仍将原告加倍惩处。若是保甲匿牌不交者，与之同罪。关于廖腾煊的行政实践，不仅见于传世的《海阳纪略》，而且，在徽州文书中也有

着明确的记载。已故的著名“徽学”专家周绍泉先生，曾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珍藏的一册徽州文书，专门研究过十七世纪晚期的一桩诉讼案件。根据他的研究，康熙年间休宁发生“胡一案”，儒学生员李炳、李同，状告李家世仆胡一之子胡得寿强奸朱三德之媳余氏，要求县令拘究胡一等，“惩奸锄凶”，以期“振纲肃纪”。对此，廖腾煊批示曰：“准纸皂拘！”此一批示说明，“纸皂代差”在清代前期的徽州的确实施过，而这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揭文书的真实性。

清代官府执法中的“纸皂代差”，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它希望小事由乡族调处，大者才用“纸皂代差”，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差役

扰民，而且对于违法者也是先礼后兵的一种警告。当时，官府和士绅通过各种方式劝导民众息讼。例如，清代流传于徽州的“劝民息讼歌”中就唱道：

世间有事莫经官，人也安然已也安然。
听人刁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
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
行到州县费盘缠，坐也要钱睡也要钱。
乡约中证日三餐，茶也要钱烟也要钱。
三班人役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
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枷也要钱。
唆讼之人实可嫌，赢也要钱输也要钱。
听人唆讼官司缠，田也卖

细数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转型”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青年学者如何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中国学术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与明天。

“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近期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活动的主题，目的在于鼓励青年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关切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与历史使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赵修义曾感慨，“最重要的自信并非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而是未来我们能够创造什么”。

此次征文活动面向全国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征稿，共计收到来稿 872 篇，涉及 20 个学科，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无疑是此次来稿的主力军。但是，英雄莫问出处，与教授、副教授同台共舞，并不影响一位来自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大三学生脱颖而出。

问题意识对于理论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善于在社会进程中

今天的青年学人研究什么？如何研究？

本报记者 刘迪

找到问题、提出问题，没有将关涉现实的问题作为理论工作的引导，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就只能是私人的、浮泛的、抽象的。从征文来稿情况看，大部分青年学者能够从特定的研究领域出发，把握时代问题。虽然讨论的都是中国转型问题，但视角多样，话题多元，比如：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国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网红直播进行讨论，等等，都对当下社会充满关切。

今天的青年学人在研究方法上何有独到之处？《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叶祝弟表示，从来稿情况看，青年学人更为重视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这一方面与征文中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青年学人受到良好的学术范式的训练。然而，也因为过于重视形式上的精致，部分文章思想性有所欠缺。此外，

受到阅历与经验的限制，有些青年学人对于中国转型中的重大问题思考不够深入；有些青年学者习惯于在象牙塔里专注学理思考，与现实问题的结合成为研究工作的短板。

当然，也有不少青年学人并不满足于做书斋里的学问，更关注象牙塔外中国的转型发展、改革创新，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创新”、“转型”（包括“社会转型”“传媒转型”“中国基层治理的转型”“外交战略转型”“乡土文学转型”“师范院校的转型与‘青椒’的学术行动策略”等等）是来稿中频频出现的热点；“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教育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中的伦理问题研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城市治理与服务型政府”、“古今中国的江湖治理”、“古代文化中的治理观”……关于“治理”的话题不断被青年学者提及。他们从不同角度大胆探索，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完屋也卖完。

食不充口衣不全，妻也艰难子也艰难。

……

在当时人的印象中，官员或是由科举正途出身，或是殷实人家捐纳而成，相对而言知书达理，行事亦多顾忌。而吏役则出身卑微，浑然不知礼义廉耻之所在，为人处事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也正因为如此，“纸皂代差”之出现，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差役对那些迫不得已打官司的百姓的滋扰。对此，清代前期著名官僚于成龙就认为，“使百姓省一分之差费，即可早完一分之正供”。从其初心来看，这是一种便民措施，也通常被视为为官一方的德政。不过，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涉嫌违法者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循规蹈矩的“良民”固然不少，但钻山打洞之“刁民”想来亦不乏其人。因此，无论是纸皂代差还是木皂代隶，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明代余自强甚至认为“木皂隶无用”，他在《治谱》中指出：

木皂隶不要钱，不要酒肉，设此法者，其意良苦，然木皂隶去几次而人不至，非活皂隶去，能知木皂隶在谁家乎？

木皂隶如此，纸皂恐怕亦不例外。揆情度理，无论是木皂还是纸皂，都只是一种类似于时下“整改通知书”那样的东西，目的是希望当事人自觉遵守纪律守法，但其实际成效如何却颇多疑问。想来，自古迄今，“老赖”从来都不曾少过。

而在另一方面，差役总在想方设法、寻找扰民的机会。根据理想设计，以纸皂自拘，两造至，

直接由官员判定是非曲折，而不假手于吏役。不过，原告与被告常常视如水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势必会引发争执。在这种背景下，原告很可能就会勾结吏役，撕衣毁票，将事情闹大，以激怒官府，从而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这就为吏役的正式介入，创造了充分而有利的条件。对此，清代褚人获深有感慨地说道：“今纸皂虽设，而隶卒之需索如故，名存而实亡矣。”

在清代的官箴书（如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陈朝君之《莅蒙平政录》等）中，都曾提及“纸皂牌式”，这说明纸皂代差的做法颇为普遍。以徽州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在各地广泛推行木皂、纸皂代差的同时，在清代前期的婺源，抄本《控词汇纂》则为我们展示了另外的一幅画面：“柜上交粮，名虽自封投柜，实出六房书办。”雍正四年（1726 年），当地“奉抚宪魏大老爷严禁滥差扰民”，规定是以纸皂和木皂征收钱粮。但在实际上，婺源县的催征，仍然是滥用图差、正差、帮差、限差、籤差名色，以至于东、西、南、北四乡，“山陬僻壤，无一地而无差，无一日而无差。正供之外，差费数倍，百姓无何，实有告流不能、求生不得苦况”。苛政猛于虎，基层民众最为切身的体会，就是衙役下乡的滋扰。这一点，无论是“木皂代差”还是“纸皂代差”，都未能真正杜绝。

看来，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虽然看似完美，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却颇为复杂。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学人重要的使命。当代青年学人一方面关注国家改革发展、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观层面问题，另一方面深入思考与自身联系紧密的教育、信仰等微观层面问题，进而在这两方面思考的基础上，自觉地突破西方学术话语及其研究范式，积极践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青年学人们也以今日的独特视角关注中国，有的凭借敏锐的思维和专业的知识背景，大胆揭示在社会经济政治话语中被忽视、被遮蔽、被误读的深层内容；有的对于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过人的洞察力，关注网红、直播、玄幻小说、流行语等时新的话题。这些讨论都具有鲜明的青年特色与时代特征，同时创新了话语表达方式。

做学问最终要建构的并不是空中楼阁，学人的成长也褪不去时代的色彩。作为评审，年近八旬的赵修义教授感慨不已，他将“后生可敬”与“后生可畏”送予后辈学人。“我发表第一篇像样的文章时，大概已经是 45 岁的中年人。我非常羡慕你们，成长在这样一个渴望思想、渴望理论，更能够出思想、出理论的时代。”

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个中国青年